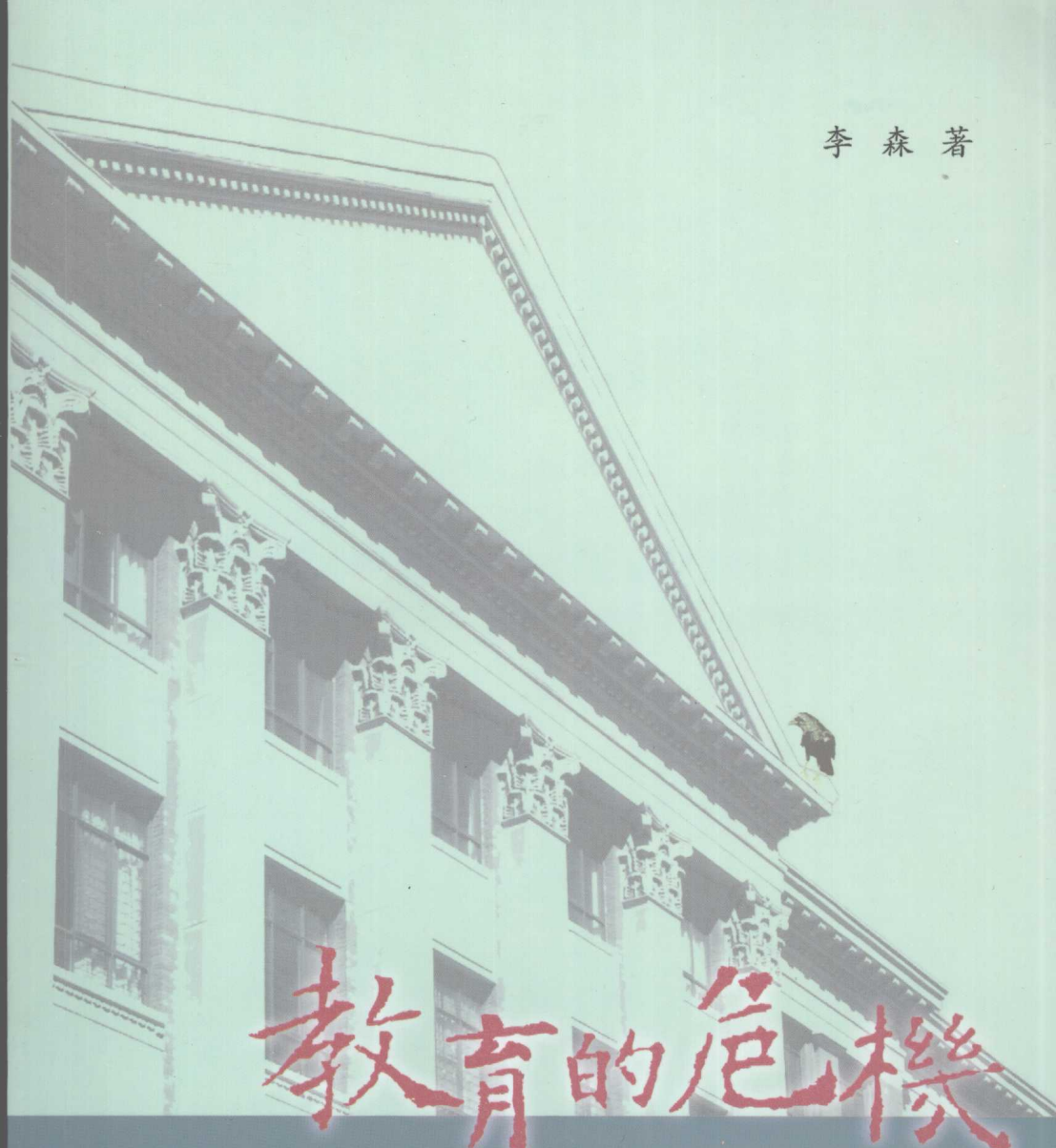




李 森 著

教育的危機

Educational Crisis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教育的危机

Educational Crisis

李 森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的危机

李森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2

ISBN 978-7-5360-5272-7

I. 教... II. 李...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4391 号

责任编辑:林宋瑜 黄玉雯

技术编辑:易 平

装帧设计:吴 坚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肇庆市星湖大道)

开 本 889×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7.375 1 插页

字 数 15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活着，无望的罪责与羞耻（代自序）

一、银杏，锦绣年华

大清早，上班的人还没有来，晨读和锻炼的人倒是来了几个。我走在云南大学美丽的校园里，走在名声远扬的银杏道上。我想，树冠上的那群鸟是刚刚飞来的吗？或许，他们早就是这里的主人了，我不认识它们，鸟们也不认识我，但与它们的自由自在相比，我甚至感到自己有点卑微。我想，又有几只松鼠长大了，不知我们是它们的风景，还是它们是我们的风景。每天早晨，我是来这里洗涤心灵的，经常要扪心自问，还有没有心灵，如果有的话，它是什么样的的一种存在形态？我们的心灵，集体心灵，个人心灵，是文化的庙堂，还是地狱的门槛？翻出来看看，先打点露水，再晒一晒，免得干瘪或发霉。这是我向自然学习的一种方式，或者祈祷，或者感恩，每天都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哪怕是一滴眼泪，一声叹息。

我们深陷现代都市的烦躁和喧嚣之中，陷入各种所谓文化的圈套之中，不停地堕落，越来越远离人性和生活的淳朴和善良。学术谎言被视为正当，生活变成了利益的计算和运作。长此以往，几乎没有人觉得算计有什么不对了。学术和生活中的算术高

2 教育的危机

手，非常让人羡慕，倍受“上头”和“下面”赞美。如果遇到不羡慕，不赞美，还说点怪话的人，是要被另眼相看的。良知的存在就是蔑视，就是挑战。每当想到这些事情，就有点痛心，但又不得不痛心。我不怪任何人，因为这是个心灵的问题，个人是很难控制和呵护好自己的心灵的。尤其在利益和文化成规面前，人通常都会自甘堕落，自甘遮蔽。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很不可靠的。当然，生活中有美好的事情，也有龌龊的事情，是为常态。但如果龌龊的事情太多，就会让良知尚存一息的心灵感到存在的慌张和虚妄。我们热爱美好的事物，实际上是发现我们有美好的心灵。发现自然美景或美好事物的能力多数人都有，只是在这个时代，个人心灵已经很难被自然和事物之美所沁润。心沉默着，利益狂躁的肉在颤抖。我们变得卑微了，我们不敢坚持点什么了，我们害怕常识了。我们是一些乡愿，自认为很成熟，很有修养，我们越来越人模狗样，呵，我们发迹了。

这是又一个秋天，银杏叶黄了。许多人都来照相，仿佛是在朝圣。或许还有心灵活着，或许还有人怀揣着良知蔑视我们。这种人是一个社会的希望，是将越来越繁琐的人间事简化到常识的引领者。这样的人在哪里？他不需要太多的理论，不需要项目和奖励，只需要单纯，像银杏叶一样单纯和明亮。这样的人在哪里？我想起了种植银杏树的那个老花工，他的名字叫武文忠。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校园里的这些树多数都是他种的。那时花园里没有水管，他每天挑水浇灌。没有这位老花工，我的春夏秋冬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可是，这个老花工没有立过什么项，得过什么奖，搞过什么工程，开过什么会，发表过什么宣言。他是沉默的，像银杏一样沉默而高贵。多少教授都没有历史，武文忠有历史，有生命，那样辉煌，创造了如此直观如此令人动容的锦绣年华。武文忠师傅不知道，从1983年始，我们的校园里有了一个文学社，它的名字叫“银杏”。这是他给我们的名字。我曾担任银杏文学社的社长，这个文学社改变了我的人生，使我变成了一个文人，一个活着的人。我的锦绣年华变成了银杏的一枚枚春

芽，一片片落叶。我们的老师张文勋先生曾写过一首诗赠银杏文学社：

上苑多银杏，高梢挂月华。
柔情千叶秀，傲骨一枝斜。
盛夏盈窗绿，深秋遍地霞。
争春非本意，笑看满园花。

1990年，我留校工作已经两年，我也写过一首《银杏》：

它是树 我的邻居
我年年接受邀请
出入它的季节
我并不知道
它的灵感来自何处
有时一点也不珍惜色彩
一摇身就哗哗抖掉
那种才气 让人敬畏
有时我从窗子
看见满枝的果子
不禁想象它的花朵
好像彼此多年
它把美好的事物隐瞒
而现在 只要仔细听
就可得到
所不同的，我是人
媚俗 想占上风
有一回我爬到它的顶部
露出一个头
伸手去拿它的果子
小雀在我对面叫个不停

也不知是否与我有关
在高位，看见了我的屋顶
我的窗子是多么小而阴暗

二、学校，书生不再误国了

我们过去常讲“书生误国”，“百无一用是书生”，说的是书生既不懂体制，又不懂江湖，还不懂得现实人生。我们说的这种书生，总是自以为是，自己钻进自己的小小世界中去自我折腾，自我抒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吟风弄月，患得患失，牢骚满腹，一股酸石榴的味道，一种迂腐的发霉味。的确，这种书生固然可恨，“恨其不争”，但是，同志哥也，现如今的书生们，已经不能小看了。他们成熟老到了，既懂体制，又懂江湖，更懂得人生了。在现在的书生堆里混，我不但已经闻不到了酸石榴的味道，还随时都能闻到玫瑰糖的香甜了。因为现在的书生，都跑到学科建设、成果制作、人才生产的流水线上作业去了。越来越多的书生，都变成了专业的什么“家”，学问的什么“者”，工程的什么“师”，社会的什么“柱子”，“屋宇”什么“梁”，“花园”里的什么“丁”，寺庙项目的什么“住持”，“山头”的某个老大，“填补空白”的某块“基石”了。书生们几乎都有“先进性”，几乎都是“模范”人才。反正大家都各得其所，你追我赶，歌声嘹亮，欢乐得很。教育界这样的大好局面，实在是来之不易的。的确也，我们的教授存量，我们的教师队伍存量，我们的学生存量，我们的博士、硕士生存量，每一个数字统计出来与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的加起来相比，都会很吓人的。有的博士生导师同时带20几个博士，硕士生导师带二三十个学生的也大有人在。书生教授们都成超人了。在西方大学，人家一个专业几十年才能培养的研究生数，我们有的大学一个书生在三年之内就能完成。大家看看，我们的书生不再误国了。是呀，只要

书生不再误国，事情就好办多了。大家都来把我们的锦绣年华填进表格，装进项目，变成成果消费了吧，像所有吃着玩着舒服的消费品一样，过期是要作废的。

我有一个朋友，是昆明某小学的语文教师，有一天我遇见她，问她最近忙什么，她说在忙学科建设。她告诉我，压力很大，她的一些同事都弄到了市级、省级的学科带头人了，而自己才搞了个区级的。言谈之中也还有点自豪的意思，因为还有许多人连区级学科带头人都还没有弄到手。她说，忙于教书，没有时间写论文去发表，很吃亏，要评上一级学科带头人，关键是看发表论文和获奖情况，至于如何教书，书教得好不好，那是不需要考虑的。我问她教书教得好，真的不管用吗？她说教书教得好不好，无法量化，填表时不好填，获奖栏目、成果栏目、项目栏目空着，人家就不认为你是个好老师。关键是要发表论文，要获奖，要搞到项目，或者跟领导关系好也行。我感到很恐怖，还以为只是大学在玩这些个游戏，现如今连小学也玩上了。既然小学都玩上了，中学肯定也在玩的。学校究竟是干什么的？教师是干什么的？学生来学校又是来干什么的？这几个问题本来很简单的，工农兵都知道，不需要解释。可是，现如今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了。学校的管理主要是发文件、开会、填表、应付检查评估、搞所谓学科建设、搞项目、套钱、满世界忽悠，等等。很少有人愿意思考，也很少有人勇于思考。人们宁愿异化，也不愿意改变现状。如果有个抵抗异化的人，就被认为是异端，人们会议论纷纷，只想把这样的人用笼子关起来，拉去街上展览。不是展览大熊猫，而是展览巨型刺猬。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村子里最高的那棵大梨树上，架着一个大喇叭。每个村子都架着一个。每天早晨和晚上，喇叭都在念报纸，唱“文革”歌曲，发布指令。喇叭的轰鸣之声，使一些人的心颤抖，同时，也使一些人十分舒服。感到舒服者，总以为那声音就是他们的声音。有时候，他们讲话也是那种声音，那种广播词汇，报章词汇。我记得有一条狗常在梨树下睡觉，

6 教育的危机

从来不管喇叭如何轰鸣。那是一条幸福的狗，它不需要考试，不需要填表，不需要搞学科建设，不需要获奖，他就可以活着，可以睡觉。我的《眺望》组诗里有一首诗实录此事，名曰《梨树下》：

梨树上
架着一个大喇叭
梨树下
睡着一条灰狗
大喇叭不停地叫
前途——光明
前途——光明
灰狗翻了个身
继续睡觉
梨花纷纷落下
落在灰狗上
灰狗睡着了
没有发现梨花

三、活着，无望的罪责与羞耻

没有罪责感和羞耻感是正常的么？我常常这样追问。我还没有敢追问罪恶感，要追问罪恶感是要有原罪意识的。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名曰《教师》：

你把洁白的棉花缝制成谎言的尸衣
你把文字图案，堆砌成天空的墙壁
你让所有的鸟儿，都贴着高墙不停地敲着鸟喙
你还不停地摇着风车，渴望下雨

不知怎么搞的，我常常想起德国一百年来的历史，想起这个国家的教育。有时很辛酸，有时很茫然。

德国战后之所以能很快强大起来，就因为这个民族有着伟大的反省能力，听取了雅斯贝尔斯这样的伟大思想家的忠告。尊重本民族的思想精英，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民族品格啊！其实，伟大的思想多来源于常识或者本身就是常识的表现，伟大的思想也只有变成常识之后，才有具体的功用和力量。许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但为什么不能按照常识行事？有一位教授问我，为什么天下人的头脑都像木鱼一样，和尚怎么敲，就怎么响？为什么天下木鱼的响声都是一样的呢？我说，答案很简单，因为木鱼都是木头做的。那位教授已经七十多岁了，仍然富有激情，他说激情使他年轻，凭一辈子的研究心得和人生经验，他最大的感想是，贵族基因的高贵是非常恒定的，尽管有时候也有变异。的确，缺乏高贵的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要进行文明和文化形态的反省是困难的。有反省能力的条件是，人必须有罪责感和羞耻感。人在利益和谎言面前，如果没有罪责感和羞耻感的话，人是什事都能做得出来的。一个民族有没有集体罪责感和羞耻感，可以去观察这个民族的教师和医生。如果教师和医生把谎言和欺骗视为正当，那么这个民族即便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也是没有用处的。事实上，我们并不缺少雅斯贝尔斯，我们缺少的是那即便在法西斯时代仍然能让雅斯贝尔斯活下来的那种土壤。我要问我自己，你为什么敢吃饭，敢睡觉呢？你靠什么换来了生存条件？你做的事情哪一样与人的精神存在和社会功用发生过有本真意义的联系？你发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哪些字是与人性的高贵与生活的美好价值关怀有关？如果有关的话，你可以吃，可以安稳地睡觉，如果没有关系的话，你怎么也吃得下，睡得着？是不是你吃饭睡觉都是理所当然的？工人农民为你耕织纳税，都是应该的么？自己可以给自己找到答案，但这样做有什么作用呢？

批判和追问，已经没有意义，没有心肠。鲁迅先生说过：

8 教育的危机

“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只是人活着，思考自己的似水年华，难免悲情连连。2006年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名曰《死亡》：

有一个人
在山中
弯腰挖土豆
把土豆装满了箩筐
过了一会
那人不见了
来了一头牛犊
站了一下
摇了一下头
也不见了
来了一个春天
下了一场雨
春也不见了
土地养过的
都不见了

四、社会，批评与争论创造了生活

2006年，我写过一组诗，名曰《眺望》。记得在写这组诗时，我想着伏尔泰。这位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不相信宗教，但为了不影响普通民众的信仰，他不时走进教堂去。他活着一直受到教会的迫害，死时也不得安宁，遗体被秘密运到香槟省的一个小教堂里安放。1791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民才把他的遗体运回巴黎。人们在他的灵柩车上写着：“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我写的

《眺望》组诗中有一首，名曰《乌鸦》：

死亡，还是新生
时候到了
乌鸦会来叫喊的

不是所有的乌鸦
都在恶俗的光中眩晕
不是所有的乌鸦
都会书写寓言

但现在，如日中天
所有的乌鸦
都被锁在光里

我又想起了伏尔泰的那句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言说，是正常生活的基础。言说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使人变得高尚的一个尺度。在教育和文化生活中，如果没有言说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样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1727年牛顿逝世，英国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国葬仪式。两位公爵、三位伯爵、一位大法官抬着牛顿的灵柩送行，举国哀悼。伏尔泰动容地说过：“走进威斯敏斯特教堂，人们瞻仰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而是国家为感谢那些为国争光的最伟大人物建立的纪念碑。这便是英国人民对才能的尊敬。”

卡尔·雅斯贝尔斯说：“有一种要求，认为每一种世界观都应该在大学里得到展现，比如用哲学的形式，用历史学的形式，用社会学的形式，用政治学的形式，这也同样不符合大学的理念。如果某种既存的世界观没有造就第一流的学者，那么这种观念在科学上就没有立足之地。每个人当然都喜欢跟自己志趣相投

的人一起生活。但是，只要一个人承认大学的理念，只要他在未来院系成员的选拔中有发言的机会，他就应该保持一种倾向，即把最离经叛道的观点引入到大学里面。他这样做，是为了给富有成果的学术争鸣创造机会，是为了不计任何风险地拓宽知识的视野——最重要的，是为了让高超的学术成就和非凡的智力水准成为大学的唯一决定因素。对于那些与自己的目标截然相反的人，大学不仅应当容忍他们，而且要接纳他们。只要这些人愿意在大学的范围内宣扬并且讨论他们独特的信仰和经典，只要他们充许自己的信仰成为科学研究的一个促动，他们对于大学就是有用的。但是，如果他试图用这些信条来主宰大学，如果在学校职位候选人的选拔过程中，他任人唯亲，偏袒自己的信众，如里他企用先知式的说教取代学术上的自由，那么他就要和坚守大学理念的其他大学成员形成剑拔弩张的对立。”^①

没有批评，就没有学术；没有批评，就没有创新。这也是一个常识。可是，我们已经不需要这个常识。由于缺乏批评的环境，以致偶尔出现一个批评者，就被视为不和谐之音。我们忘记了一点，真正的和谐，是运动中的和谐，和谐是以思想的砥砺和生活的价值参与为前提的。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教育也好，学术研究也罢，就不可能有责任。因为责任本身是一种价值选择和参与。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有深广的时代内含的，这种内涵同时植根于常识之中。真正有意义的社会生活，也是价值选择的结果。价值生活不是一个显在的模式，在生活中，价值的认同需要持续不断地批评和争论。只有批评和争论，才能使价值尺度显现出其精神性的力量。任何时代的社会形态中都有其价值内涵，具体时代和具体生活形态中的价值内涵，是其文化精神的体现。批评和争论能使我们的生活价值变得更加具体而有效。批评与争论创造了生活，创造了人，创造了社会正义。

① 卡尔·雅斯贝尔斯著，邱立波译《大学之理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106~107页。

五、黑洞，2004年2月4日的日记

最近几日心情有点恍惚，工作忙碌之余，去租借了一个叫《黑洞》的电视连续剧碟片来看。这个戏演的是现实生活中一个平常的故事。某市副市长聂大海的儿子聂明宇是该市著名企业龙腾集团的董事长。这个集团的赚钱生意，是走私、开赌场。为了使生意畅通无阻，拉拢省市各级干部，用黑社会的运行模式和杀人灭口的手段来维持生意是必然的。红黑两道在利益面前的合作，这是很常见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老百姓不知道内情罢了。

这个戏虽然对红黑两道同穿一条裤子的勾当，揭露得很痛快，但还是个主旋律戏。因为这个戏的艺术张力，就表现在正义和邪恶的较量上。最后，正义的力量战胜了邪恶。人民群众看了会皆大欢喜的。可是这样老套路的戏，据说还是没有电视台敢播放。真是非常可笑啊。其实，像《黑洞》这样的戏，是真正的小骂大帮忙——既让老百姓出了口气，又让老百姓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我们的老百姓真是可爱啊，其实，他们在什么朝代有过希望呢？老百姓遇上了什么受欺负的事，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特别是在旧社会，你跟黑道较量，你肯定死定了。

我儿子五岁半，也很喜欢看这类戏。他问我“黑洞”是什么？我说，就是一个黑暗的洞，里面没有光，也不知道有多深。儿子说，他要用千万只电筒去把黑洞照亮。我说，这个黑洞不是电筒可以照亮的黑洞，“黑洞”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我问儿子懂不懂？他说，懂。其实，儿子根本不懂“黑洞”是什么意思。就像千千万万老百姓一样，只要看见正义战胜了邪恶，好人战胜了坏人，也就很高兴了。

正义的力量战胜邪恶的例子不能说没有。可是，在旧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多数时候是邪恶战胜了正义，甚至可以说，邪恶根

本不需要与正义交手就胜利了。因为，正义是非常孤独、脆弱的。除非是在阳光明媚的新社会，正义才能荷枪实弹走在大街上，一点都不脆弱。

六、萩原朔太郎，2003 年 7 月 10 日的日记

我曾经对日本人比较反感，有时也就像个孩子一样，故意不喜欢读日本人写的书。不过日本人也有好作家，比如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就很不错。近日在书店随手翻阅《诗性的哲学散步》，觉得这位叫做萩原朔太郎的诗人兼随笔作家，还真的有些见解。比如，在《现代诗人》一篇中，萩原朔太郎就说：“浪漫派诗人是骑士。象征派诗人是知识分子。现代诗人则是布尔乔亚（商人）。”我再给他补充一句：“当代中国的许多诗人是痞子。”这伙痞子获得功名的主要手段，是诽谤、践踏他人，他们已经完全不顾脸面了。

萩原有一篇小随笔叫《友情与沉默》，写得真是太好了：

友情的建立，在于对他人的弱点闭眼不看、缄口不言。即便在朋友面前，或者在朋友背后，都恪守这一点。

要获得友情，最为困难的一种修养，就是学会沉默的忍耐。那种神经质的、缺乏内心磨砺的人，恐怕是不会有众多友人的。而广交朋友的人，往往被友情包围的人，大概属于意志力顽强的精神上的磨练主义者。他们往往为人所尊敬、被朋友爱戴。然而，在他们隐秘的内心笔记上却恰恰只写着他的隐忍，零散地写着他对众多友人的责备与怨结。但，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对此秘密的始终沉默，使之成为与墓石同葬的历史。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已逝友人的墓前，往往脱下帽子，沉湎于无限的感慨之中。

萩原对交友这门学问体验如此之深，我估计他是疾恶如仇的人，经常为交友之事烦恼。那些天生就很圆通的人是很难有如此体验的。何况，他还有顶“日本现代抒情诗之父”的高帽子。钱钟书先生年轻时，也是个口无遮拦的率真之人，在“江湖”上受了许多委屈之后，干脆与文坛、学界之类的无聊江湖断绝关系，躲进小楼，独成一统去也。“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优秀的人物总是被同行或小人诋毁。要做到把自己心中的责备与怨结“与墓石同葬”，谈何容易啊。

七、人生，黄永玉选择以狗为友

2005年9月27日，我随吴松校长到建水县去参加祭孔活动。次日是孔子2556年诞辰。当晚，我在临安宾馆看电视，突然看见中央台播放对黄永玉先生的一个采访。记者问，他给表叔沈从文写的墓碑碑文是：“一个战士，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而如果给自己写碑文，会写什么样的话？他支吾一下说：“爱，怜悯，感恩。”我很感慨。现在的人，已经很少有有情有义的人，懂得爱、怜悯、感恩的人了。具有人文品格的人，爱、怜悯、感恩，是其心灵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黄老自称刁民，因为正人君子太多了啊。

还有一点，让我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他说，他不为意义活着，也就是不为目标活着。这一点只有少数老人才参悟得到。我们的老人，我们的青年，通常都是为意义、目标而活着的，至少在口头上如此。一个杰出的老人，考察其是否杰出，首先要看看他是否敢于放弃虚伪和嚣张。放弃活着的“意义”，也就是放弃生活、知识、理想塑造的教条。一个被理论的暴力塑造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怜悯之心的，也不会有爱，更不知道什么是感恩的情怀。

《南方人物周刊》采访黄老：“您曾写过，人在狗的眼睛里是

长得比较奇怪的狗，您在凤凰、北京有一个狗的联合国，您觉得人有哪些地方比不上狗？”

黄永玉先生回答：“狗单纯得多啦，人太复杂。人会说：我想我喜欢的人一定天天在想我，事实上他想不想你，你也不知道。但狗它可真是在天天想你，你要回家的话，一进门，狗都会过来。每只狗有每只狗的脾气，有的狗真的喜欢你就用嘴巴咬你；真的喜欢你，有的就拿脸去贴你……它们表达感情的方式都不一样。我有一只老狗在北京，我这次要离开它的时候，那只狗就一直拿脸贴啊贴啊，他知道我要走了他就贴我。我在凤凰的那只狗呢，看到我就咬我，到处咬，它是这么来表达感情。狗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不会嫌家贫，讨饭人的狗也一直跟着他，有钱人把它买了，让它跟着有钱人，它不会的。人就不要说了。狗没有那么多利害关系，没那么复杂。”

鲁迅说过：“死人若不活在活人的心中，便是真正的死了。”可是，活在别人的心中是不能强求的。有些人，一辈子就想办法如何活在人们的心上。为此，处心积虑地想办法表现自己仍然是人。这种心态，愈到老年愈强烈。一个害怕不在别人心上的人，是可悲的。

在电视节目中，黄老刁民谈笑风生地开玩笑，说着自己的死亡：“我对死有几个方案，一是把骨灰放在抽水马桶里面，请一个尊敬的老先生拉一下。我的爱人反对，说会塞住水管的，还要找人来修，多麻烦，那就说明第一个不能用；第二个方案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地包起来栽花，送给朋友。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朋友晚上睡觉的时候知道骨灰在花盆里，会害怕，睡不着觉。那也没有意思。我说，那只好让朋友永远痛恨我，咬牙切齿地骂我。我把骨灰揉在面粉里头，包饺子给大家吃。哈哈！——完了宣布：你们刚才吃的是黄永玉的骨灰！”黄老是轻松地消解一切“死人”和魔鬼的。包括他们的死亡秀。而且哈哈大笑，完全是个老顽童，是个没有被可怕的目标武装起来的、真正通脱的老刁民。